

唐传奇校读札记（二）

李剑国

内容提要 本文就唐传奇《高力士外传》、《洞庭灵姻传》、《枕中记》、《唐暄手记》、《南柯太守传》、《集异记》的八处人名地名讹误作出考辨校正。

关键词 唐传奇 人名 地名 校正

在校读唐传奇过程中，发现人名地名常有讹误。有些在字面上往往不易觉察，而且由于没有其他版本及校勘资料出现异文而引起注意，因此很容易忽略过去。这些讹误，笔者常常是在为其作注而查阅有关史料时才得以发现。有些讹误则是明显的，但由于以往校勘者未能最充分地掌握校勘资料，难作是正，也只好存疑沿误而已，或者作出误校。下面所考校勘正的，是几篇唐传奇中出现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人名地名讹误。

一 《高力士外传》：“紫曜”、“第五国珍”、“广州都督”、“皇甫铎”

此传郭湜撰，约作于代宗大历初，时任大理寺司直。今存《顾氏文房小说》本，一卷。又收入《虞初志》、《五朝小说·唐人百家小说》、《重编说郛》、《唐人说荟》、《龙威秘书》、《唐开元小说六种》、《旧小说》等，或题作《高力士传》。诸本于顾本原有的少数阙字和明显讹字有所校补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丁如明辑校《开元天宝遗事十种》，收有此传，以顾本为底本，参校诸本。顾本尚有一些人名地名有严重讹误，须作校正。

1. 三问群臣卿士，皆云：“江淮漕运，转输极难，臣等愚蒙，未知为计。”上甚不悦。后李林甫用紫曜之谋，爰兴变造；牛仙客取彭果之计，首建和籴。

按：此为裴耀卿事，原文为对仗省作“裴耀”，顾本讹作“紫曜”，诸本皆沿误未改。裴耀卿（681—743），字焕之，绛州稷山（今属山西）人。《旧唐书》卷九八、《新唐书》卷一二七有传。裴耀卿兴办漕运之事，《新唐书》卷五三《食货志三》载之颇详：

开元十八年，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师，玄宗访以漕事，耀卿条上便宜曰……二十一年，耀卿为京兆尹。京师雨水，谷踊贵。玄宗将幸东都，复问耀卿漕事。耀卿因请罢陕陆运，而置仓河口，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，输粟于仓而去。县官雇舟，以分入河、洛，置仓三门东西。漕舟输其东仓，而陆运以输西仓。复以舟漕，以避三门之水险。玄宗以为然，乃于河阴置河阴仓，河西置柏崖仓，三门东置集津仓，西置盐仓。凿山十八里以陆运。自江淮漕者，皆输河阴仓，自河阴西至太原仓，谓之北运，自太原仓浮渭以实关中。玄宗大悦，拜耀卿为黄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江淮都转运使。以郑州刺史崔希逸、河南少尹萧灵为副使，益漕晋、绛、魏、濮、邢、贝、济、博之租输诸仓，转入渭。凡三岁，漕七百万石，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。

“紫曜”古有此词。骆宾王诗《夏日游德州赠高四》序云：“紫曜连星，开龙文于剑匣。”用《晋书·张华传》张华观斗牛间有紫气而得宝剑典，紫曜即紫气。《云笈七签》卷八《释三十九章经》第三十四章云：“东华真人呼日为紫曜明，或曰圆珠。”则又指日光。“紫曜之谋”在字面上或许可以理解为天子之谋、朝

廷之谋，容易忽略过去；即便不解其意，疑有讹误，但若不悉心稽考史实，亦只能悬疑不决。此处校勘，全依据史实考证，没有版本和其他文献资料作为考辨依据，纯属理校。下边三处校勘也属于这种情况。

2. 九月三十日，（高力士）至巫州……经一年，忽见本道观察第五国珍谪至夷州，与第五相饮……

按：“本道观察第五国珍谪至夷州”文有脱讹。本道观察指黔中道观察使，治所在黔州（治彭水县，今属四川），巫州属黔中道。时黔中观察使乃赵国珍，并不是第五国珍。《旧唐书》卷一一五《赵国珍传》云：“赵国珍……天宝中，以军功累迁黔府都督，兼本管经略等使……在五溪凡十余年……代宗践祚，特嘉之，召拜工部尚书。”又卷六四《徐王元礼传》云：“永泰元年，女婿黔中观察使赵国珍入朝，请以延年子前施州刺史讽为嗣，因封嗣徐王。”郁贤皓《唐刺史考全编》“黔中道黔州”列有赵国珍，任期为约天宝十载至宝应元年（约751—762）。

赵国珍并未谪至夷州，谪至夷州的是第五琦。《旧唐书》卷一二三《第五琦传》载：“乾元二年（759），以本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初，琦以国用未足，币重货轻，乃请铸乾元重宝钱，以一当十行用之。及作相，又请更铸重轮乾元钱，一当五十，与乾元钱及开元通宝钱三品并行。既而谷价腾贵，饿殍死亡，枕藉道路，又盗铸争起，中外皆以琦变法之弊，封奏日闻。乾元二年十月，贬忠州长史。既在道，有告琦受人黄金二百两者，遣御史刘期光追按之。琦对曰：‘二百两金十三斤重，忝为宰相，不可自持。若其付受有凭，即请准法科罪。’期光以为此是琦伏罪也，遽奏之，请除名，配流夷州。”夷州属黔中道，治今贵州凤冈。

顾本“本道观察第五国珍谪至夷州”，将黔中道观察使赵国珍与贬谪夷州的第五琦合为一人，错得离谱。高力士贬巫州，第五琦贬夷州，夷州在黔州西南，中隔珍、思二州，巫州则在夷州东南，中隔充、业二州。高力士与第五琦谪地相去甚远，而能相会饮酒，且又涉及观察使赵国珍，个中缘由，可能是第五琦被谪夷州，先至黔州拜见观察使赵国珍，而高力士因故亦自巫至黔，遂得以与琦相会。今将“本道观察第五国珍谪至夷州”校改作“忽见本道观察赵国珍，第五琦谪至夷州”，中间有脱文。无从取校，姑改如此。

3. 九月，灵槎发朗州。十一月至襄州，有诏令复旧官爵，追赠广州都督。

按：“广州”乃“扬州”之讹。《旧唐书》卷一八四《宦官传·高力士传》：“代宗以其耆宿，保护先朝，赠扬州大都督，陪葬泰陵。”《新唐书》卷二〇七《宦者传上·高力士传》同。又《全唐文》卷九九三有《唐故开府仪同三司赠扬州大都督高公神道碑》。其为“扬州都督”凿然无疑。高力士潘州人，其父赠广州大都督（《旧唐书·高力士传》）。潘州属于岭南道，岭南道治所在广州，故而高力士父赠广州大都督。高力士死后赠官不可能也是广州大都督，乃赠扬州。疑顾本涉力士地望或其父赠官而误。

4. 一左丞，皇甫铄是也。

按：“皇甫铄”当作“皇甫侁”。《元和姓纂》卷五“乐陵皇甫氏”：“侁，尚书左丞。”《全唐文》卷五二一梁肃《新郑县尉皇甫君墓志》：“君……尚书左丞侁之爱弟。”顾本以“侁”为“铄”，形讹也。“铄”读 xiǎn，“侁”读 shēn，读音不同。

二 《洞庭灵姻传》：“闻君将还吴”

本篇乃李朝威作，原收于唐末陈翰《异闻集》，《太平广记》（以下简称《广记》）卷四一九即据《异闻集》引录。《广记》多以人名为题，此篇题为《柳毅》，故后世稗编多题作《柳毅传》。然据《类说》卷二八《异闻集》等宋人文献，原名作《洞庭灵姻传》。《广记》此篇，后又收入《虞初志》、《艳异编》、《情史类略》、《五朝小说·唐人百家小说》、《重编说郛》、《唐人说荟》、《龙威秘书》、《艺苑摭华》及鲁迅《唐宋传奇集》、汪辟疆《唐人小说》等，大都题作《柳毅传》。宋末罗烨《新编醉翁谈录》辛集卷一《柳毅传书遇洞庭水仙女》，乃此传之节录。

《广记》本虽为早出，但可校补处颇多。《广记》自身各种版本及《类说》、《醉翁谈录》、《虞初志》等本都有重要校勘价值。这里只就一处紧要文字作出考辨，也是地名问题。此处文字是：

闻君将还吴，密迹洞庭，或以尺书寄托侍者，未卜将以为可乎？

这是龙女对柳毅说的一段话。柳毅所还之处乃吴地，即今江苏苏州一带地区。然开头明言“应举下第，将还湘滨”，后文亦云“毅，大王之乡人也，长于楚”，则其故乡在湘水之滨，今属湖南。两地一东一西，邈不相及，李朝威原作不应抵牾如此。对这处明显的矛盾之处，张友鹤《唐宋传奇选》注释称：“吴，通常是指现在江苏一带地方，这里却指湖南。三国时吴国的疆界包括湖南在内，所以湖南也可以称做‘吴’。”这是为维护原文而作出的曲解，其实原文“吴”与“湘滨”必有一误。是不是《广记》在流传中文字发生讹误呢？好像不是。今存《广记》各本及《虞初志》等本此处均无异词。而且，范致明《岳阳风土记》云：

君山崇胜寺，旧楚兴寺也。有井曰柳毅井。按《灵姻传》始言还湘滨，中言将归吴国，固无定处。

然则前人因事阙文，后人遂以为实，此亦好事者之过也。

范致明北宋人，其所见《灵姻传》可能不是单篇流传者，应当是收在《异闻集》中的，称《灵姻传》是省称。其本亦作“将归吴国”，与《广记》所引《异闻集》无异。可见北宋流传的《异闻集》之《洞庭灵姻传》，已有版本作“还吴”或“归吴国”，《太平广记》所据《异闻集》，与之正同。

然而，宋代流传的《异闻集》还有别种版本，文字与此不同。《类说》本作“闻君将还”，又《绿窗新话》卷上《柳毅娶洞庭龙女》、《古今事文类聚》前集卷三四（无出处）、《古今合璧事类备要》前集卷五〇引《柳毅传》亦同，均无“吴”字。而《醉翁谈录》作“闻君还乡”。二者虽文字略异，但不言“还吴”是一致的，前者无“吴”字，后者“吴”作“乡”。这样，柳毅所还之乡，就是湘滨，与吴地了不相涉。

其实，龙女之父乃洞庭君，即湖南洞庭湖龙神。湘水北入洞庭湖，柳毅归湘滨之乡，必经洞庭湖。传说说“洞庭含纳大直”，含纳百川只有湘岳之洞庭湖才可当之，湘、沅、澧、汨等水皆入洞庭。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描写洞庭湖景象“衔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涯，朝晖夕阴，气象万千”，观此即可知矣。

但容易发生误解的是吴地之太湖亦名洞庭，太湖中有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，故而有楚洞庭与吴洞庭之别。《水经注》卷二九《沔水下》云：“韦昭曰：五湖，今太湖也。《尚书》谓之震泽，《尔雅》以为具区，方圆五百里。湖有苞山，《春秋》谓之夫椒山。有洞室，入地潜行，北通琅邪东武县，俗谓之洞庭。旁有青山，一名夏架山，山有洞穴，潜通洞庭……余按二湖俱以洞庭为目者……宜以湘江为正。”酈道元以为，洞庭之名应当以湘江所入之洞庭为正，太湖之称洞庭者只是别称。太湖之所以亦称洞庭，是因为古人以为太湖洞庭西山（又名包山、苞山、夫椒山）之地穴潜通楚地洞庭湖，而“洞庭”之意，就是洞穴的意思。《山海经·海内东经》晋郭璞注：“洞庭，地穴也，在长沙巴陵。今吴县南太湖中有包山，下有洞庭，穴道潜行水底，云无所不通，号为地脉。”西晋张华《博物志》卷八《史补》亦云：“君山有道，与吴包山潜通。”君山，在楚地之洞庭湖。

《洞庭灵姻传》写到“洞庭之阴，有大橘树焉，乡人谓之社橘”。楚洞庭产橘，这在《山海经》早有记载，《中山经·中次十二经》云：“又东南一百二十里，曰洞庭之山……其木多杣、梨、橘、櫟……帝之二女居之。”櫟即柚，亦柑橘之类。郭璞注《中山经》“荆山”条曰：“櫟似橘而大也，皮厚味酸。”屈原亦曾作有《橘颂》，云：“后皇嘉树，橘徕服兮。受命不迁，生南国兮。”但巧的是太湖亦盛产柑橘，唐宋时非常有名。刘长卿《吴中闻潼关失守因奉寄淮南萧判官》：“木落姑苏台，霜收洞庭橘。”（《全唐诗》卷一四九）顾况《凉公洞庭孤橘歌》：“洞庭橘树笼烟碧，洞庭波月连沙白。”（《全唐诗》卷二六五）皎然《别洞庭维谅上人》：“情着春风生橘树，归心不怕洞庭波。”（《全唐诗》卷八一八）又《洞庭山维谅上人院阶前孤生橘树歌》：“洞庭仙山但生橘，不生凡木与梨栗。”（《全唐诗》卷八二一）所写都是太湖橘。

宋代洞庭柑非常有名。韩彦直《橘录》卷上云：“洞庭柑，皮细而味美，比之他柑韵稍不及，熟最

早，藏之至来岁之春，其色如丹。乡人谓其种自洞庭山来，故以得名。”庞元英《文昌杂录》卷四云：“南方柑橘虽多，然亦畏霜，每霜时，亦不甚收。唯洞庭霜虽多，即无所损。询彼人，云洞庭四面皆水也，水气上腾，尤能辟霜，所以洞庭柑橘最佳，岁收不耗，正为此尔。”范成大《吴郡志》卷三〇《土物下》云：“真柑，出洞庭东西山。柑虽橘类，而其品特高，芳香超胜，为天下第一。”龚明之《中吴纪闻》卷五云：“洞庭山，太湖之中有包山，一名洞庭。韦苏州皮陆唱和所言洞庭及苏子美诗云‘笠泽鲈肥人脍玉，洞庭柑熟客分金’，皆在吴江也。”苏东坡曾作《洞庭春色赋》与《洞庭春色诗》，叙云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，名之曰“洞庭春色”。赋中有“携佳人而往游，动雾鬓与风鬟”句，正用《洞庭灵姻传》句。洞庭柑佳者价格昂贵，是送礼佳品，据李心传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一七〇及卷一九五载，平江洞庭柑每对值二千文，官府多是贱价科买，民极苦之。南宋直学士洪遵曾向高宗献洞庭柑，但高宗节俭，自称“朕平时未尝毫末有取于民”，不肯接受。

太湖柑橘名气很大，而楚地洞庭橘似乎名声不显。所以范成大《吴郡志》卷九《古迹》云：“柳毅井在洞庭东山道侧。按小说载毅传书事，或以谓是岳之洞庭湖。以其说有橘社，故议者又以为即此洞庭山尔。”意思是说柳毅传书发生在岳阳南的洞庭湖，但因为提到橘社，而太湖洞庭山盛产柑橘，所以人们认定传书之处是在太湖。

太湖有洞庭东西山，又产柑橘，这是《洞庭灵姻传》出现“闻君将还吴”错误的原因。原文可能是“闻君将还乡”，浅人妄改“乡”为“吴”；或者原文是“闻君将还”，而妄增“吴”字。今据《醉翁谈录》改“吴”为“乡”，校改作“闻君将还乡”。

由于《太平广记》“还吴”的错误，致使后世附会的柳毅遗迹，除《岳阳风土记》所言柳毅井在洞庭君山外，大都在太湖。前引《吴郡志》提到洞庭东山柳毅井，此外记载尚多，如：

柳毅泉事具图经，泉在太湖之滨。虽大风桡之不浊，虽旱不耗，此所以为异。（北宋朱长文《吴郡图经续记》卷下《往迹》）

今洞庭山在太湖，湖中有东西二山……东山有柳毅井为古迹。（《吴郡志》卷一五《山》）

柳毅桥。（《吴郡志》卷一七《桥梁》）

柳毅泉在太湖侧。（南宋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卷五《平江府·古迹》）

柳毅为洞庭龙女传书事，乃荒唐之说。今吴城有柳毅桥，太湖滨有柳毅泉，意毅乃吴人也。（元高德基《平江记事》）

清初褚人获《坚瓠五集》卷一《柳毅井》还称：“洞庭东山有井，云是当年柳毅时所凿，周回橘树参差。月夜常见龙女与毅双双出游。”

今岳阳君山仍有柳毅井，而苏州、太湖今亦有柳毅井、柳毅桥、柳毅亭、柳毅祠等，古迹较岳阳更多。古书传写的一处讹误，竟给苏州、太湖增添许多人文旅游资源。苏州人堂而皇之介绍说：柳毅，苏州人。国家邮政局2004年发行《柳毅传书》特种邮票，苏州人力主首发式在苏州举行。想必受到岳阳人反对，最终还是在宁夏泾源县举行首发式，那是柳毅初见龙女牧羊的地方。

三 《枕中记》：“居延山”

沈既济《枕中记》有二本，一收在《文苑英华》卷八三三，题《枕中记》，一引录于《太平广记》卷八二，题《吕翁》，注出《异闻集》。《类说》卷二八摘录陈翰《异闻集》，亦题《枕中记》。二本多有异文，以《文苑英华》本为善。明清近世稗编所收《枕中记》，如《虞初志》、《合刻三志》、《雪窗谈异》、《唐人说荟》、《龙威秘书》、《无一是斋丛钞》、《说库》、《旧小说》等，皆为《广记》本。鲁迅《唐宋传奇集》、汪辟疆《唐人小说》皆据《文苑英华》本校录。

中一节云：

是岁，神武皇帝方事戎狄，恢宏土宇。会吐蕃悉抹逻及烛龙莽布支攻陷瓜、沙，而节度使王君奭新被杀，河湟震动。帝思将帅之才，遂除生御史中丞、河西道节度。大破戎虏，斩首七千级，开地九百里。筑三大城，以遮要害。边人赖之，立石于居延山以颂之。

按：上述各本皆作“居延山”。“居”字《文苑英华》校：“一作拔。”乃作“拔延山”，鲁迅《唐宋传奇集》、汪辟疆《唐人小说》均未据改。今按作“拔延山”是，考辨如下。

唐代确有拔延山。《旧唐书·地理志三·陇右道·廓州》：“广威……先天元年改为化成县，天宝元年改为广威县。县界有拔延山。”拔延山在陇右节度使治下廓州境内西北部，今青海尖扎县北。居延山，可有两解。一指居延地区之山。古居延海，汉称居延泽，魏晋一称西海，唐称居延海，今为索果诺尔、嘎顺诺尔东西二海，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境。汉于居延泽西南置居延县。其地唐属甘州，在甘州北境同城守捉（天宝二年改宁寇军）一带。一为居延山。《大清一统志》卷四〇八《乌喇忒·山川》：“居延山，在旗东三十五里。蒙古名昆都伦。”《大清一统志》叙乌喇忒旗沿革云：“唐景龙二年，张仁愿于河外筑三受降城，此为中受降城。”其地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，黄河以北。

传文写吐蕃悉抹逻及烛龙莽布支攻陷瓜、沙，节度使王君奭被杀，河西节度使大破戎虏，是有史实依据的。《旧唐书》卷一九六上《吐蕃传上》载之甚详：

（开元）十五年正月，君奭率兵破吐蕃于青海之西，虏其辎重及羊马而还。……其年九月，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及烛龙莽布支攻陷瓜州城，执刺史田元献及王君奭之父寿，尽取城中军资及仓粮，仍毁其城而去。又进攻玉门军及常乐县，县令贾师顺婴城固守，凡八十日，贼遂引退。俄而王君奭为回纥余党所杀，乃命兵部尚书萧嵩为河西节度使，以建康军使、左金吾将军张守珪为瓜州刺史，修筑州城，招辑百姓，令其复业。时悉诺逻恭禄威名甚振，萧嵩乃纵反间于吐蕃，云其与中国潜通，赞普遂召而诛之。明年秋，吐蕃大将悉末朗复率众攻瓜州，守珪出兵击走之。陇右节度使、鄯州都督张忠亮，引兵至青海西南渴波谷，与吐蕃接战，大破之。俄而积石、莫门两军兵马总至，与忠亮合势追讨，破其大莫门城，生擒千余人，获马一千匹，牦牛五百头，器仗衣资甚众，又焚其骆驼桥而还。八月，萧嵩又遣副将杜宾客率弩手四千人，与吐蕃战于祁连城下。自辰至暮，散而复合，贼徒大溃，临阵斩其副将一人。贼败，散走投山，哭声四合。……十七年，朔方大总管信安王祎又率兵赴陇右，拔其石堡城，斩首四百余级，生擒二百余口。遂于石堡城置振武军，仍献其俘囚于太庙。于是吐蕃频遣使请和……

《新唐书》卷二一六上《吐蕃传上》、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三亦有详细记载，《通鉴》且称：“朔方节度使信安王祎攻吐蕃石堡城拔之……自是河陇诸军游奕拓境千余里。”

《枕中记》所写“大破戎虏，斩首七千级，开地九百里”，即以此段史实为本。河西节度使，置于景云二年（711），治凉州（治今甘肃张掖市），领赤水、建康、玉门、墨离、新泉、豆卢六军，赤水、白亭、交城、张掖四捉守，及凉、甘、肃、瓜、沙五州。陇右节度使置于开元元年（713），治鄯州（治今青海乐都县），领临洮、河源、莫门、宁塞、积石五军及秦、河、渭、鄯、兰、武、洮、岷、廓、叠、宕等州。河西、陇右二镇军队破吐蕃，地域广泛，涉及青海、瓜州、大莫门城、祁连城、石堡城等。瓜州治晋昌县，在今甘肃酒泉市安西县东南。大莫门城在今青海共和县东南，祁连城在今甘肃张掖市民乐县东南，石堡城在今青海湟源县哈城东石城山。唐军破吐蕃，主要在青海湖以东及今甘肃中部西北部一带，未及甘州北境居延地区，故边人立石处绝非在甘州居延之山，而应为廓州拔延山。至于中受降城一带之居延山，更非破吐蕃之地，其地边患乃东突厥。据《旧唐书·中宗纪》及卷九三《张仁愿传》，神龙三年（707）突厥入寇，张仁愿为御史大夫、朔方道大总管，次年（景龙二年）在黄河北筑成三受降城，各距四百余里，遥相应接，断绝突厥南侵之路。《枕中记》云“筑三大城，以遮要害”，只是借用张仁愿筑三受降城之事，时间地点都不相吻。要之，立石纪功处应以廓州拔延山符合情理，《文苑英华》校语“居”作“拔”，宜据改。之所以作“居延山”者，盖拔延山不显，而居延声著，遂以致误。

另外，传文写边人立石颂功，可能以瓜州为张守珪刻石纪功为原型。《旧唐书》卷一〇三《张守珪传》载：“守珪以战功加银青光禄大夫，仍以瓜州为都督府，以守珪为都督。瓜州地多沙磧，不宜稼穡。每年少雨，以雪水溉田。至是渠堰尽为贼所毁，既地少林木，难为修葺。守珪设祭祈祷，经宿而山水暴至，大漂材木，塞涧而流，直至城下。守珪使取充堰，于是水道复旧。州人刻石，以纪其事。”只不过所颂不是战功而是水利之功。

四 《唐暄手记》：“张辄”

此作原载于陈劭《通幽记》，《太平广记》卷三三二引。末云“事见唐暄手记”，是则采自唐暄本人自作。南宋沈氏《鬼董》卷五采入此记，删去原文“开元”字样，冒充宋事，窃为己作。《古今说海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广艳异编》、《情史类略》均自《广记》录入。

开头一节云：

唐暄者，晋昌人也。其姑适张恭，即安定张辄之后。

按：“辄”读 yuè。明沈与文野竹斋抄本、南宋沈氏《鬼董》卷五作“轨”。《古今说海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广艳异编》作“辄”。中华书局版《太平广记》汪绍楹校：“明钞本辄作轨。”只列出异文，未定是非。

文称唐暄姑夫张恭是安定张辄之后，而对张辄不作任何介绍，那么这个“张辄”必定是历史上的有名人物。而所谓“张辄”史无其人，“张辄”亦复如是。剩下的就是确定“张轨”的可能性了，查查史书是否有此人，是否出自安定。不错，《晋书》卷八六有《张轨传》。张轨（255—314），字士彦。西晋安定乌氏（今宁夏固原市东南）人。永宁元年（301）拜凉州刺史，卫土勤王有功，累迁侍中、太尉、凉州牧、西平郡公。在凉劝农桑，立学校，重用本地士人，河西于时独盛。卒谥武穆。其后张祚称凉王，太元元年（376）国灭。张氏割据河西八十余年。张轨是西晋大臣，声名显赫，其后代又建凉国（即前凉），在西河地区应当是人人皆知的人物。晋昌郡即瓜州，治晋昌县（今甘肃安西县东南），地属河西。故而唐暄特别说明自己的姑姑嫁给张轨后人，多少有炫耀之意。

五 《南柯太守传》：“偶觊淳于生梦”

李公佐此文见引于《太平广记》卷四七五，注出《异闻录》，亦即陈翰《异闻集》。《广记》依其体例，标目《淳于梦》，未用原题。《类说》卷二八陈翰《异闻集》有《南柯太守传》节文。明清近世稗丛，从《广记》收入此传，改作《南柯记》，见《虞初志》、《合刻三志》、《唐人说荟》、《龙威秘书》、《无一是斋丛钞》、《说库》、《旧小说》等。《艳异编》卷二二梦部亦收，题从《广记》。鲁迅《唐宋传奇集》、汪辟疆《唐人小说》据《广记》校录。

《南柯太守传》末节云：

公佐贞元十八年秋八月，自吴之洛，暂泊淮浦，偶觊淳于生梦，询访遗迹。翻覆再三，事皆摭实。

按：据传文，淳于梦已于贞元十三年丁丑岁终于家，何得五年后李公佐见之？这里明显有误。对此处讹误，鲁迅《唐宋传奇集》、汪辟疆《唐人小说》等均仍其旧文，而学者乃多有校改者，但说法有异。

王梦鸥《唐人小说研究二集——陈翰异闻集校补考释》第三编《异闻集遗文校补》二八《南柯太守传》（艺文印书馆1973年版）认为贞元十八年疑为十一年之误。在其《唐人小说校释》下集（正中书局1985年版）中又作了肯定的表述，并称：“《颜氏家训·杂艺篇》云：‘萧子云改易字体，邵陵王颇行伪字。至为一字，唯见数点。’此言齐梁以后，书字多讹。《全梁文》卷六庾元威《论书》有言：‘晚途别法，贪省爱异，浓头纤尾，断腰顿足；“一”“八”相似，“十”“小”不分。’此处误‘十一’为‘十八’，正由此故。验以敦煌写卷，复尔从同，不足怪也。”王氏未提出校勘依据，只是据梁人“‘一’‘八’相

似”之语而断，纯系臆测。

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6 年版《唐宋传奇集》书后所附《校记》云：“‘棼’沈本作‘貌’。按：上文云棼卒于贞元十三年丁丑，自不能于十八年再与公佐晤见，疑作‘貌’是。‘貌’作‘遗貌’解，即‘遗容’。”周绍良《唐传奇笺证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版）亦称：“明沈氏野竹斋抄本《太平广记》‘棼’作‘貌’，如非人名，即当作遗容解。原‘棼’字疑误。”明人沈与文野竹斋抄本作“淳于生貌”，以“棼”为“貌”，汪绍楹校《太平广记》多据明抄本，此处未出校。以上二校据明抄本为说，以为偶觐者乃淳于棼“遗容”。然传云“询访遗迹，翻覆再三，事皆摭实”，文意承上，何以能向“遗容”询访？这不是活见鬼嘛。

张友鹤《唐宋传奇选·校勘记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4 年版）认为“鲁本古籍刊行社编者校记，疑‘棼’应据沈本作‘貌’，是遗貌、遗容意。虽亦可通，究嫌牵强”。他据明弦歌精舍如隐堂刻本《虞初志》将“棼”改作“儿楚”，称：“指其子淳于楚，则完全可解矣。”张氏这里有误，其实《虞初志》（明弦歌精舍如隐草堂刻本）卷三《南柯记》作“兕楚”，“兕”即“貌”，《艳异编》卷二二《淳于棼》即作“貌楚”。张氏将“兕”误读为“兒（儿）”字。笔者《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》1998 年第二次印刷本《补正》，曾引《虞初志》和《艳异编》的异文“偶觐淳于生貌楚”，判云：“疑‘生’字乃‘子’字之讹，或‘生’字下脱‘子’字，则李公佐所见者乃淳于棼之子淳于貌楚。”结论其实与张友鹤差不多，其子一作“楚”一作“貌楚”而已。

以上诸校皆误。幸好《太平广记》还有个钞宋本，这一疑问得以解决。清康熙孙潜曾据钞宋本校谈恺刻本，将异文录于谈本上。此本今藏台湾。严一萍作《太平广记校勘记》（艺文印书馆 1970 年版），取材主要是钞宋本。这个钞宋本极佳，远胜《广记》他本，可惜我们以前不易得知。钞宋本“棼”字作“兄楚”，原文是“偶觐淳于生兄楚”。原来李公佐所见者乃淳于棼之兄淳于楚。“棼”、“楚”皆从“林”，确实是兄弟之名。回头再看《虞初志》、《艳异编》的“淳于生兕楚”，乃误“兄”为“兕”，明抄本的“淳于生貌”，沿“貌”字之误而又脱“楚”字耳。

六 《集异记·王维》：“出入于公主之门”

薛用弱《集异记》今存之本，以明顾元庆刊《顾氏文房小说》本最早，此本分第一、第二两卷，凡十六篇，各有标目，首为《徐佐卿》。《丛书集成初编》、《世界文库》取入顾本。中华书局 1980 年出版点校本（与《博异志》合为一册），亦以顾本为底本。又有一卷本，刊《虞初志》、《续百川学海》、《历代小史》、《古今逸史》、《唐宋丛书》、《合刻三志》、《五朝小说·唐人百家小说》、《重编说郛》、《雪窗谈异》、《秘书廿一种》、《四库全书》等，与顾本同，乃合二卷为一卷。又有《唐人说荟》本，亦一卷，于十六事外，从《太平广记》补辑《裴越客》、《丁崑》、《张华》、《蒋琛》四事，末二事均非本书。《说库》取入此本。南宋曾慥《类说》卷八摘录《集异录》（明嘉靖伯玉翁抄本作《集异记》）十一条，陶宗仪《说郛》卷二五选录四篇，注二卷。《类说》、《说郛》所录均在今本中。

《王维》一篇中云：

时进士张九皋，声称籍甚，客有出入于公主之门者，为其致公主邑司牒京兆试官，令以九皋为解头。

按：《太平广记》卷一七九引《集异记》、《唐人说荟》、《说库》“出入于公主”五字作“出入公主”，无“于”字。而《类说》、《虞初志》作“出入九公主”，“于”作“九”。南宋杨伯岳《六帖补》卷二〇引《集异》亦称“同至九公主第”。作“九公主”是，应据改。张友鹤《唐宋传奇选》沿误未改，而将公主注为太平公主，误甚。《唐才子传》卷二《王维》云：“王维九岁知属辞，工草隶，娴音律，岐王重之。维将应举，岐王谓曰：‘子诗清越者，可录数篇琵琶新声，能度一曲，同诣九公主第。’”当据《集异记》。

九公主，又称九仙媛、如仙媛。唐柳理《常侍言旨》（《说郛》卷五）载：

玄宗为太上皇时……幸勤政楼。楼下市人及往来者愈喜，曰：“今日再得见我太平天子。”传呼万岁，声动天地。时肃宗不豫，李辅国诬奏云：“此皆九仙媛、高力士、陈玄礼之异谋也。”下矫诏迁太上皇于西内，绝其扈从……翌日，竟为辅国所构，九仙媛于岭南安置，力士、玄礼长流远恶处。

《太平广记》卷一八八引《戎幕闲谈》亦载，文字大同，云：“既而九仙媛、力士、玄礼长流远恶处。”

此事《新唐书》卷二〇八《宦者传下·李辅国传》、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二一肃宗上元元年（760）亦有记。《新唐书》云：

时太上皇居兴庆宫……帝命陈玄礼、高力士、王承恩、魏悦、玉真公主常在太上皇左右，梨园弟子日奏声伎为娱乐……初，太上皇每置酒长庆楼，南俯大道，因裴回观览，或父老过之，皆拜舞乃去。上元中，剑南奏事，吏过楼下，因上谒。太上皇赐之酒，诏公主及如仙媛主之……会帝属疾，辅国即诈言皇帝请太上皇按行宫中……还西内，居甘露殿……俄而流承恩播州，魏悦溱州，如仙媛归州，公主居玉真观。

《资治通鉴》亦云陈玄礼、高力士久侍卫上皇，上又命玉真公主、如仙媛内侍。有剑南奏事官过楼下拜舞，上皇命玉真公主、如仙媛为之作主人。后高力士流巫州，王承恩流播州，魏悦流溱州，陈玄礼勒致仕，置如仙媛于归州。《新唐书》、《通鉴》均言如仙媛被流归州，与《常侍言旨》不同。

如仙媛即九仙媛，又称九公主。《通鉴考异》曰：“《常侍言旨》作九仙媛，《唐历》作九公主女媛……盖旧宫人也。”司马光以为如仙媛乃旧日宫人。《御定（康熙）孝经衍义》卷二一注“如仙媛”云：“唐制，九嫔中有昭媛、修媛、充媛，如仙必媛之名。”《新唐书》卷七六《后妃传上》载：“唐制，皇后而下有贵妃、淑妃、德妃、贤妃，是为夫人；昭仪、昭容、昭媛、修仪、修容、修媛、充仪、充容、充媛，是为九嫔。”然则如仙媛殆为玄宗父睿宗生前所宠嫔妃，名如仙。之所以称九仙媛、九公主，盖排行第九，而称公主者，自非封号，盖玄宗后宫称呼，言其地位尊如公主也。

玄宗自蜀归为太上皇，九公主与玄宗胞妹玉真公主是他身边的亲信人物，可见与玄宗关系相当密切。而在玄宗朝，九公主确实权势极大。李潜《松窗杂录》曾载，宰相姚崇构陷张说，玄宗令崇与御史中丞共案其事。一书生为张说出计，献鸡林郡夜明帘给九公主，求其说情。九公主入谒，具为奏之，玄宗急命高力士就御史台宣前所案事并宜罢之。九公主之贵重可知。裴铏《传奇·张云容》中亦记开元中刘兰翘、萧凤台“亦当时宫人有容者，为九仙媛所忌毒而死之”。《王维》写王维得九公主赏识，九公主召京兆府试官，令其以维作解头，遂得以顺利登进士第，反映的也正是九公主的尊贵地位。

宦官李辅国虐待上皇，打击清除其身边亲信。九公主不过是旧宫人，所以与高力士等被流放边远之地。对女冠玉真公主就客气多了，令其仍回玉真观，她毕竟是肃宗的亲姑姑啊。

[作者简介] 李剑国，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。发表过专著《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》等。